

# 「身分論」小議

● 趙毅衡

劉東認為，大陸學子到海外，由於「生存困境」，不得不「廉價販賣」中國材料，難以「感受到真正學術使命」，從而失去理解中國問題的資格。

他的指責無法反駁：暫居海外者若不同意，正被劉東說中，只能越抹越黑；暫居國內者若不同意，就是忘了自己是甚麼人。他談的不是問題，而是身分。

我是被劉東指責為用「臉譜化」和「戲劇腔」來「有意誤導和驚嚇海外輿論」的人，最好免開尊口。我在此只想說一下劉東指責的我那篇〈「後學」與中國新保守主義〉在海外的命運，以說明該文如何「遵命」而作，用來「專供西方老師獵奇」。

我的確用英文重寫了此文，投給一家中國研究刊物。

這家刊物花了較長時間，請了三位專家審定。按規定他們不會泄露審閱者的名字，所以審定意見直截了當說明了西方漢學界的口味。三篇評語幾乎看法完全一致：不能用。我在此

摘幾句比較好聽的：「拐彎抹角，暗示過於曖昧」；「不清楚作者究竟指的是些甚麼事情」；「說了好多事，卻沒有具體解釋來龍去脈」；「如果要讀者自己研究一番才能弄懂，何必要此文？」；「只與中文刊物有關，無益於（西方的）中國研究」；「整個寫法不對頭」。

材料上既未討好，觀點呢，是否「誤導和驚嚇海外輿論」？評者說：「此文作者採取一種很遭忌諱的反大眾（文化）立場。」看來這些洋鬼子沒有那麼容易受驚。

得到如此評語，當然是退稿。這是我至今未能發表的唯一一篇英文論文。

我那篇文字以中文發表後，贊同少，反對多。贊同者有目前居國內的中國人，反對者也有暫居國外的中國人。沒有一個人認為我寫得糊塗，看不懂。

那些評語，不能說沒道理。我那篇札記式的文字，的確是寫給中國同

行看的，他們的關心面、了解面與西方漢學家很不相同。西方漢學界希望把問題介紹得清楚一些，材料周全一些。至於觀點，有也不要太多。我的寫法過於粗線條，他們不知所云。用此標準來看《二十一世紀》上發表的、劉東認為只是在迎合西方口味的那幾篇文章，若想要發表英文稿，怕是都得完全重寫。其實我那篇東西根本不適合寫成英文稿，「先意承旨」沒弄清楚。正是西方漢學家對我的文字中那種「歷史責任」造成的迫切心情感到不可理解。

回過頭來說，關於「身分」，有此看法的倒不只劉東一人。自從福柯(Michel Foucault)的話語一權力論被發現可以用來支持「甚麼人說甚麼話」的老命題，學術的「部族化」越來越理由十足。有人說，暫居海外者由於未能身臨其境，不可能理解當前中國文化實情，他們說的至少是一種未經證明的認識論；有人說身在西方學院中，必是西方話語霸權的一部分，至少算是在用新殖民主義理論；劉東不同，他認為暫居海外者並不缺乏「對中國現狀的切身體驗」，但是必定為了「生存」，就是說，為了混飯吃，喪失了做研究的責任感。遠不如外國人、華裔、或港台華人，他們至少不是「人為洋涇浜」，只是本來就「講不好中文」，「學術動機」不太可疑。原因？這些人不會有「生存」困難，不需要賣學為生。

劉東認為阿拉伯人薩伊德(Edward W. Said)雖寓居美國，哪怕他的「預期讀者也仍然是西方同行」，不一定一開口就是「文化帝國主義」。以身分否定薩伊德，是他不能同意的

「排外立場」；連直認自己是「經濟移民」的印度人斯比瓦克(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)，好像也沒有被劉東認為已經失去「學術使命感」。

回答可以很簡單：你們中間還沒有出現薩伊德或斯比瓦克。如果劉東如此討論，必將令人服氣，餘下的事是大家共同努力。但是劉東說的是身分，直白說，大陸人出國必是窮得以學術為「謀生手段」。因此，完全沒有必要討論具體的學術觀點。

我個人覺得劉東提的「動機」問題很有意義，每個治學者都應當自律自省。但這適用於一切人，無論居於何處，無論甚麼種族。

反過來，如果以集團身分判定集團動機，我們大家對此類「分析法」及其效果記憶猶新。

